2001,11/3-5 廈門大學· 第七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

台灣漢語共時方言學：歷史與展望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洪惟仁

0 摘要

本文所謂的「台灣漢語方言學」討論的是「研究台灣漢語的方言學」，而不是「在台灣的漢語方言學研究」，所謂「方言學」著重在閩南語或客語內部方言的研究而非以漢語為中心的閩南語或客語研究，既然名為「共時方言學」，我們也不討論方言史、歷史方言學的研究。本文將介紹台灣漢語方言學的發展史，各個流派的研究業績，也概要地討論到台灣的方言學在方法上的進步。

台灣漢語主要有閩南語和客語兩支，其中閩南語使用人口約佔本土語言使用人口的 85%，客語約佔 15%。閩南語人口顯然佔絕對優勢，台灣漢語的調查研究也集中在閩南語，客語的研究相對的少得多。

台灣漢語的調查研究始於日據時代殖民地政府的語料收集，主要是辭典的編纂，其次是教科書。但是這個時期在方法上和西方傳教士的語料收集差不多，不是真正的方言調查，但在質量上有輝煌的成果。

台灣的漢語方言調查一部分是中國漢語方言調查的延續，但是以董同龢為首

的漢語方言學家採用了人類學的方法，不再受固定字表的限制。鍾露昇開創了台灣地理方法學的方法，此一方法為卜溫仁、洪惟仁等人所延續。目前他們正利用GIS(地理資訊系統)軟體將調查成果製成方言地圖。

台灣漢語方言學研究最近的發展趨勢是利用社會語言學的方法，研究不同的變體在不同年齡層、不同性別、不同階層的分佈，利用這個研究法，我們將清楚地看到演變中的語言現象。

關鍵詞：台灣漢語、漢語方言學、方言調查、地理方言學、社會方言學

1 語料蒐集的時代

台灣漢語的調查研究雖然始自日據時代殖民地政府，但是日據時代的辭典編纂仍然承襲西方傳教士的閩南語研究成果，因此本文的敘述追溯到西方傳教士的語料蒐集。

1.1 西方傳教士的語料蒐集

漢字的性格基本上應該是表意文字，不適合作為語音描寫的工具，由於工具上的缺憾，漢語方言調查在中國沒有發展的條件。因此漢語方言調查發軔於採用標音文字的西方人是可以理解的。

十六、七世紀以來，天主教傳教士為了傳教的目的，紛紛把漢語方言加以羅馬字化，其中以北京話及閩南語的文獻最豐富。十九世紀初基督新教傳教士更積

極地為漢語方言羅馬字化，1840 年南京條約簽定以後，傳教士可以合法的在中國重要通商口岸自由傳教，於是沿海各地的漢語方言紛紛地出現了許多用羅馬字標寫的辭典、字典。

S.W. Williams（衛三畏廉士甫）的《漢英韻府》(1874)和 Herbert A. Giles 的《華英大辭典》 (1892)是西方傳教士漢語詞彙蒐集的集大成，前者記錄了南京、上海、廣州、廈門四個方音，另附錄〈聖諭廣訓〉記錄了北京、南京、漢口、上海、寧波、福州、廈門、汕頭、廣州九種讀音；後者由 Parker 附錄了廣州、客家、福州、溫州、寧波、北京、華中、四川、楊州、高麗、日本、安南等十二種方音。這兩部辭書為後來的漢語歷史比較語言學提供了廣泛的基本資料，對漢語歷史比較語言學貢獻良多， Volpicelli (1896), Schaank (1897-98) 和小川尚義 (1907) 都是引用這些來作為比較材料。(詳參洪惟仁 1994〈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的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

十九世紀的傳教士出版了不少閩南語辭典，其中最有名且最有描寫價值的應屬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1837)、杜嘉德的《漢英大辭典》(1873)，在台灣只出版了一部小字典，即馬偕所編《中西字典》(1891)。在客語方面也有 MacIver(1905 英文) , Mackenzie (1926 revised); Rey(1926 法文)兩種字典。

1.2 台灣日據時代的語料蒐集

日據時代，西洋傳教士在台灣的傳教並未受到壓迫，傳教士延續了教會的研

究傳統，繼續出版了不少羅馬拼音的書籍。比較重要的是駐台南的牧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 出版了《廈門音新字典》(1913)、巴克禮(Thomas Barkley)牧師出版了《廈英大辭典補編》(1923)。巴克禮還創辦了台灣教會報(名稱迭有更易)，至今仍在發行，但已經不是完全的羅馬字了。

長老教會的傳教活動替閩南語留下大量文獻，不過這些閩南語資料不完全是台灣閩南語的實錄，而是大量攙入大陸的閩南語，尤其是廈門方言的語言成分，在台灣出版的字典裡台灣閩南語和大陸的閩南語也沒有分別，所以在方言學上的價值不高。漢語方言研究的地位不得不讓給台灣總督府屬下的專家學者。

台灣日據時代的閩南語或客語詞彙蒐集可以分為台灣總督府官方的辭典、教科書編纂以及基督教長老教會民間的辭典、教科書編纂和教會公報的發行。

台灣總督府為了統治的方便，領台伊始即非常注重台灣漢語，尤其是閩南語的研究。格於實用主義學風，對漢語方言研究的主要成績在於詞彙、語料的蒐集，以字典、辭典、教科書的編纂為主，均採用假名注音。通日據五十年，以小川尚義為首的日本學者，編纂了不同領域的字典，閩南語共十九冊，客語只有一冊。教科書 120 種以上。最有價值的作品應數小川尚義(1869-1947)主編的《日臺大辭典》(1907)及《臺日大辭典》(1931-32)、東方孝義編《臺日新辭書》(1931)、平澤平七主編《臺灣俚諺集覽》(1914)，客語方面則有《廣東語辭典》(1932)。

日據時代的詞彙收集在方法上沒有超過西方傳教士的成績，但是在質和量上

則創下了輝煌的成果，《臺日大辭典》(1931-32)所收集的詞彙約九萬條，是空前絕後的閩南語辭典傑作。

此外日據時代出版的台灣漢語教科書約 100 本，雜誌約 10 種，除領台初期的出版品水準較差，一般水準相當不錯，尤其到了末期，會話、文章的語言非常道地，注音也非常準確，是非常寶貴的語料。

綜觀日據時代的漢語方言研究主要是詞彙的調查、搜集，有一點語言地理學意義的只有《日臺大辭典》(1907)卷首所附的〈臺灣言語分布圖〉，但這張地圖應該只是以祖籍為依據，不是以方言調查資料為依據所繪製的。不過台灣的漢語方言分佈大體上和祖籍一致，所以這張地圖迄今為止仍是紀錄二十世紀初期台灣的語言分佈最為可信的語言地圖。

真正的語言調查是小川尚義、淺井惠倫的大著《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1935)，這是台灣南島語調查的高水準著作，書中所附的「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是台灣第一張根據實際調查所繪製的語言地圖。

整體說來，日據時期的日本學者的漢語方言研究成果雖然很有語料蒐集的價值，但是事實上沒有真正的方言調查的意圖。可貴的是這些作品雖然以廈門音為標準，但資料收集的範圍都在台灣，製作非以語言規範為目的，而是描寫性的紀錄，因而在學術上的價值也比較高。

1.3 戰後的詞彙蒐集

自從日本殖民地政府撤退台灣以後，日本官方的漢語方言研究自然中止，但國民政府官方沒有進行過任何台灣的語言調查，戰前的台灣語言研究成果也沒有受到任何尊重。

民間斷斷續續出版了一些字典、辭典，都是個人的事業。可分兩派，一派延續《十五音》傳統，編纂了四本韻書，以沈富進《彙音寶鑑》(1954)為代表；另外有一些辭典、詞彙集的出版，大部分是傳教士編纂辭典傳統的延續，但是比較有意義的是，戰後出版的一些教會辭典比較能夠反應台灣閩南語的實際。不過這是台灣的方言調查已經上了軌道，這些實用辭典在方言學上的價值就相對降低了。從描寫的立場言，應以王育德《臺灣語常用語彙》(1957 東京永和語學社)、日本天理大學村上嘉英 1981《現代閩南語辭典》為代表，兩位都是語言學家，其餘的作品不過是前人文獻的重新整理。從整理的成績來看，以最近吳守禮《國台對照活用辭典》(2000)、董忠司《台灣閩南語辭典》(2001)較為可取。

整體而言，站在描寫語言學的立場來看，戰後的民間研究，不論就深度或廣度而言都不及日據時代，就目的而言，大部分作品規範性大於描寫性。

2 戰後台灣的方言調查

台灣的漢語方言調查是中國漢語方言調查的延續，可以說台灣的方言調查是

中國漢語方言學在台灣的發展。但是台灣的方言調查在方法上有很大的改進，尤其越到後來，發展的方向越不同。為了明瞭發展的脈絡，有必要先對中國漢語方言調查的方法作一個簡單的回顧。

2.1 中國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的方言調查

如前所述，中國的漢語方言記音始於西方傳教士，但是正規的漢語方言調查肇始於瑞典語言學家高本漢。高本漢為了研究中國音韻學，採用了瑞典 Lundell 教授所創的瑞典方言字母，以瑞典方言調查的經驗親自調查了二十四種漢字音，並用嚴式音標記錄下來。不過高本漢所記錄的漢語偏重於北方方言，特別是山西方言，關於更複雜的南方方言，他的調查嚴重不足。為了比較的需要，有關南方方言還是不得不採用前述傳教士所蒐集的二手資料。

雖然高本漢對於這些方言資料的記音有嚴厲的批評，實際上高本漢的記音也有兩個主要的缺點：即入聲喉塞音和聲調略而不記。這些記音上的缺點都由後來的漢語方言學者所改進了。

我曾經稱高本漢是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主要因為高本漢開創了歷史比較語言學及方言調查方法。而趙元任則是中國現代語言學之母，因為趙元任把高本漢所傳來的新方法在中國發揚光大，他們對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建立功勞是很大的。(參見洪惟仁 1994)

戰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趙元任先生領導之下，從 1928 年到 1941

年之間，前後作了八次漢語方言調查。所調查的地區遍及兩廣、陝西、安徽(徽州)、江西、湖南、湖北、雲南、四川等省。個別方言區方言資料的細密達到縣級的程度。

這些調查報告已經出版的有趙元任等《湖北方言調查報告》(1948)、楊時逢《雲南方言調查報告》(1969)、楊時逢《湖南方言調查報告》(1974)，這些調查都是初步的調查，主要目的是為了製作方言分區圖。所以這些調查報告的後面都附了五、六十張依據中古音類所作的特徵分佈圖。

趙元任在漢語方言調查在記音工具上和理論上的貢獻是很大的，趙元任引進了國際音標，並且發明了五階制聲調標記法。除此之外，趙元任所領導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員做了相當廣泛的漢語方言調查，方言紀錄的方法不但注意音值的描寫，更注重音位系統的歸納，不但注意字音的調查也開始注重詞彙與語法。

但是他們進行方言調查所使用的調查字表，一直都是整個漢語系規模的調查，脫離不了漢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從字表的設計到方言地圖的呈現，乃至資料分析都以中古音類為參考座標，調查目的不脫離擬測古音、為漢語方言分區，呈現漢語方言分化的狀況等，對於活語言的調查以及小方言區的調查則有明顯的疏忽，這一點受到賀登崧強烈的質疑[1]。

[1]參見氏著岩田禮等譯 1994:24-25; 150-151，賀登崧對於中國方言調查受到歷史比較語言學

2.2 五、六十年代的台灣漢語方言調查

中國的漢語語言學家到了台灣之後，雖然在調查字表的設計、音類分析的方法仍深受中國漢語方言學的影響，卻也逐漸把重點轉到共時的描寫，走出台灣獨特的發展方向。

如前所述，雖然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在南島語方面有高水準的語言調查，但在漢語方面卻沒有任何語言調查的作品。小川等日本學者的台灣語言調查研究也隨著日本殖民政府的撤退而和台灣斷絕了關係。

台灣的漢語方言調查研究發軔於大陸變色後，中央研究院隨政府播遷來台，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為當時唯一研究漢語方言的機構。但是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方言的只有董同龢、周法高、揚時逢三人，而其中應以董同龢為代表。

董同龢(1911-1963)一面在臺大中文系、考古人類學系講授語言學課程，一面進行戰後首批用國際音標記錄的台灣語言調查。董同龢先生主要的漢語方言調查作品有〈四個閩南方言〉(1959)，包括晉江、廈門、龍溪、揭陽的方言調查，與趙榮琅、藍亞秀合著的《記臺灣的一種閩南話》(1967)是關於台北方言的調查。

另一方面周法高發表了《桃園縣志人民志語言篇》(1964)，包括閩南語、客語的方言調查。楊時逢做了一些客語方言調查，包括《台灣桃園客家方言》(1957)

的方法和漢字的侷限而疏於活語言的調查感到不滿，因而認為「中國語言地理學的調查尚未誕生」(p.24)。當時他還沒有看到鍾露昇的台灣閩南語方言地理學的調查報告。

《美濃地區的客家話》(1971)。

以上的語言學者的方言調查基本做法都一樣，都是讓發音人說故事，加以記音，然後根據語料整理出音韻系統，擺脫了使用固定的漢語方言調查字表的作法，聽到什麼記什麼，這一點和大陸時代的方言調查方法不同，採用的方法接近人類學家的調查法。

董同龢認識到閩南語的特殊性以及傳統調查字表不適用於閩南語方言調查。傳統的調查字表都是根據韻書設計的，這樣的字表適合調查讀書音，對於口語，尤其是文白異讀嚴重的閩南語就顯得技窮了，這是傳統字表不能用的原因。關於台灣的漢語方言調查方法，董同龢在〈廈門方言的音韻〉(丁邦新 1974《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p.275)解釋說：

「一方面是覺得閩語和漢字脫節遠甚於我們以往研究過的方言，如果襲用從前的方法，所得將去事實太遠；另一方面則是這一回我們有充分的時間慢慢做，不必像從前似的，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一個預定的計劃。至於調查的目的，則和以往一樣，就是要作比較研究和製成方言地圖。」

這是董同龢放棄方言調查字表的原因，但是使用新的方法所蒐集的語料比前人貧乏得多。語料的貧乏甚至影響到音位清單或音韻系統的完整。董同龢在比較Douglas《廈英大辭典》(1975)之後發現他所歸納的音位清單比前人少的多。但是他並未覺得是缺點，他在〈廈門方言的音韻〉(p.288)為自己解釋說音位短少的

原因絕大多數是音位觀念不同、處理方法有異所致，另外是一些擬聲詞之類「邊際語音」，不承認是語料的貧乏所致。

事實上問題出在董同龢沒有充分認識調查字表在方言調查上的功用。如果董同龢對於傳統閩南語文獻做過研究，可以設計出很好的調查字表。一個好的調查字表可以達到完整掌握各種不同的方言的音韻系統，作為進一步調查方言變體的分佈，製作方言地圖的基礎，如果語料太貧乏，音系就不能完整。

董同龢雖然說他的方言調查目的是要作比較研究和製成方言地圖。但是語料內容參差太大，不但沒有辦法作方言比較，方言地圖也無法製作。這樣看來，董先生的新方法和他的目的其實是互相矛盾的。

雖然如此，董同龢對台灣方言研究的貢獻仍然是不可磨滅的。董同龢不但開創了台灣的漢語方言調查，他們所得的語料可以做多方面的用途，不但有音韻學的價值，並且也可以提供詞彙、語法的資料，另外也提供了精確的民間文學紀錄，這樣的紀錄不是一般的文學工作者所能做的。

董同龢的一個重要貢獻是為台灣的漢語方言學提示了一條新的方向，就是方言的調查與研究並不止為擬測古音和漢語方言比較服務，方言本身就是一個研究的對象。董同龢說高本漢之後的漢語方言調查不是像高本漢以擬測古音為出發點，只記字音，而是方言實地的紀錄。[2]不過究其實際，戰前的中國語言學在語言

[2] 參見董同龢〈近三十年的中國語言學〉(丁邦新 1974:379)一文著者對於高本漢以後漢語

紀錄方面的業績還是很弱的，戰後董同龢把新的研究風氣帶進台灣而得到發展。

2.3 八十年代以後漢語方言調查的勃興

董同龢 1963 年英年早逝，董同龢過世以後的七十年代，漢語方言調查曾沉寂了一段時期，幸好董同龢在台大中文系兼課，培養了丁邦新作為後繼者。丁邦新本人親自作的方言調查雖然不多，有關台灣漢語方言調查只有整理董同龢的遺稿發表的〈澎湖語彙〉(1980)。但他在台大中文系培養了不少後繼者，作了一些方言調查，如：楊秀芳《台南市志人民志語言篇》(1988)；丁邦新、楊秀芳合著的《台北市志社會志語言篇》(1991)、楊秀芳《宜蘭縣志人民志語言篇》(1998)；丁邦新的學生中以楊秀芳對台灣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著力最多。第三代的台灣方言學家除洪惟仁之外差不多都是丁邦新嫡傳或庶傳的學生。

除了台灣以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漢語方言學家所做的台灣漢語方言調查。作品有藍清漢《中國語宜蘭方言語彙集》(1980)，收集了大量的詞彙；樋口靖〈台灣閩南語鹿港方言の語音特色〉(1983)是一篇小品論文。

大陸的學者所做的調查只有張振興 1983《臺灣閩南方言記略》，但調查工作是在大陸進行的，發音人離開台灣已久，詞彙、發音都已經變了，其實不能代表台灣。書中所附的台灣方言地圖也沒有實際的調查資料作依據，所以難免發生了

方言學發展的論述。

許多錯誤。

相對於閩南語方言調查的蓬勃發展，台灣客語的方言調查顯得沉寂得多了。自楊時逢(1957, 1971)以後，八十年代只有千島英一、樋口靖的〈臺灣南部客家方言概要〉(1986)作了屏東六堆的客語調查；羅肇錦也參加了上文的調查，增加東勢、竹東、楊梅的調查寫成〈臺灣客語次方言的語音現象〉(1987)算是填補了這個空隙。這兩個調查報告雖然簡單，也沒有很詳細的分析，但是調查點很多，有台灣客語地理方言學的價值，意義非凡，可惜作者似乎志不在此，並沒有做地理方言學的後續研究。

80 年代末期以來漢語方言調查似乎有復興的趨勢，但是實際上從事研究者少，並沒有引起什麼研究風潮。90 年代以後丁邦新的學生：台大楊秀芳、師大姚榮松、新竹師院董忠司、清大張光宇也培養了一些研究生，這算是戰後台灣漢語方言學第四代的學者，他們做了一些台灣漢語的方言調查。閩南語方面張屏生文化大學碩士論文《潮陽話和其他閩南語的比較》(1992)及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同安方言及其部分相關方言的語音調查和比較》(1995)都是閩南語方言調查報告；林珠彩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台灣閩南語三代間語音詞彙的初步調查與比較 - 以高雄小港為例》(1995)；陳淑娟台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關廟方言「出歸時」的研究》(1995) 兼有社會語言學意義；劉秀雪清大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金門瓊林方言探討》(1998)；李仲民文化大學碩士論文《雙溪方言調查》(1998) 都是很好的方言調查報告。

客家話方面也有一些成績，呂嵩雁東吳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台灣饒平客家方言》(1993)調查了台灣殘存的饒平、永定、詔安、長樂話方言島，江俊龍、江敏華 (1996, 1998) 調查了台中東勢客話。涂春景則是九十年代唯一做網狀調查，且企圖做地理方言學研究的人(詳本文 3.6 節的介紹)。

整體而言，方言調查報告多半是研究生的畢業論文，並且集中於中文(國文)研究所和語言研究所，可惜的是這些研究生畢業後多半沒有繼續從事台灣漢語的調查研究。取得博士學位後繼續做調查的只有鍾榮富和張屏生二位。鍾榮富有《美濃鎮誌語言篇》(1997) 〈美濃客家語言〉(1997)、《六堆客家鄉土誌語言篇》(待刊)。張屏生在許多地區做了台灣方言的網狀調查，如澎湖、屏東等，但他的興趣不止台灣閩南語，還涉及大陸同安話、潮州話，除閩南語外還調查了客語、福州話。這些資料可以貢獻於地理方言學者頗多，不過張屏生顯然志不在此，他更感興趣的是單點調查與方言比較。

另外洪惟仁關於單點方言有比較完整的調查報告，如《高雄縣閩南語方言》(1997)、《新竹市方言志》(待刊)，另有二篇調查報告刊於《元任方言寶庫》(1995,1996)，其他零星報告發表於歷年的學術研究會論文集。

以上的調查多半是單點方言調查報告，一個普遍的現象是過度偏重於音韻分析與詞彙的收集，對於語法描寫顯得比較疏忽，這跟中文系學者的學術訓練也許有關，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台灣閩南語或客語語法方面的內部方言差異比較

少。董同龢大量長篇語料的紀錄在後期的報告中，除了拙著《新竹方言志》之外也很少見。

但是共同的優點是這些方言調查不再強調個別方言直接和中古音或和北京話的比較，而是著重在為方言本身做「實地而完整的紀錄」，也就是針對個別方言做詳細的描寫，做比較時也著重在閩南語或客語內部方言之間的比較。這個特點顯示台灣在進行的是閩南語方言學或客語方言學的獨立學科的研究，而不是漢語歷史比較語言學或漢語方言學的附庸。

3 地理方言學的研究

除了董同龢由中國大陸所引進的單點方言調查與方言比較，鍾露昇由國外引進的地理方言學研究開創了另一股潮流。地理方言學(geographical dialectology)或稱為「方言地理學」，研究方言變體在地理上的分佈。[3]

[3]戰後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彙》(1962 初版 1989 二版) 、《漢語方言詞彙》(1963 初版 1995 二版)，提供了比高本漢的〈方音字彙〉更科學的漢語方言紀錄。同時各省也作了方言普查，以為推普運動的基礎研究，筆者所見的有《福建省漢語方言概說》(1957)。八十年代以後大陸陸續出版了一些個別語支的方言比較材料，如詹伯慧、張日昇《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和《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匯對照》(1987 廣東人民出版社)；李如龍、張雙慶《客贛方言調查報告》(1992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等提供了豐富的方言網狀調查資料，但細密的程度也只達到縣級。李如龍、陳章太《閩語研究》(1991)有些資料細密程度超出縣級以下，類似的其他單篇文章關於縣級以下的研究不少。這些都可以做為地理方言學的材料，但還不能稱為「地理方言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的《中國語言地圖集》(1987)結合了中國語言學的精英學者，將中國方言調查的成果用語言地圖的方式呈現出來，完成了中國語言學者長期以來的願望，可以說是中國方言學成就的最高峰。不過研究的領域仍然限於方言分區，跟真正的地理方言學仍有一段距離。關於戰後中國大陸的方言學發展不在此細表。

3.1 鍾露昇的地理方言學研究

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的另一個流派是留美學者台灣師大副教授鍾露昇老師的地理方言學研究。1967 年鍾露昇完成的《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是台灣漢語地理方言學上的開山之作。

鍾露昇的調查方法融合了西方的傳統地理方言學方法，但是也吸取了趙元任所開創的比較語言學調查方法的精髓，就是非常重視傳統文獻的比較，不過比較的出發點不是中古漢語，而是閩南語方言。為了突顯閩南語內部方言差，他對閩南語方言下過一番比較的工夫。

鍾露昇的地理方言學調查字表是經過縝密挑選設計的，雖然調查詞項只有 27 個，但是每一個調查詞項都是具有顯示方言類型意義的關鍵字，包括：

老鼠、二斤、豬肉、鵝、蜻蜓、雞、棉被、皮鞋、皮鞋、月亮、頭髮、糖廠、男人、女人、蕃石榴、口袋、稀飯、木屐、讀書、肥皂，水井、青蛙、茄子、骯髒、爸爸、媽媽、腳踏車、蕃茄。

從這些調查詞項我們可以看出，他的選字標準並不考慮中古音類，而是純粹以閩南語內部方言差為考慮。這一點完全揚棄了大陸時代的漢語方言調查方法。

關於調查點的細密程度也超出縣級以下，鍾露昇認為台灣漳泉雜居，方言複雜，「以縣市為單位，顯然不夠，因此我們以區、鄉、鎮為調查點，可以做得細

密一些。」

調查的年齡層也有限制，限制在鍾露昇所就教的台北師範大學(今台灣師大)、台灣輔仁大學說閩南語的學生為對象，共調查了 448 人，其中男性 305 人、女性 143 人。鍾露昇解釋說：

「一方面因為就地取材，比較方便；一方面想知道這些學生語言背景如何。他們大部分是一年級學生，離開家鄉不久，比較能保存他們的本地語音。語音的使用，常因年齡教育程度而有不同，這些學生的年齡從 18 歲到 31 歲，人數最多的是 19-26 歲。又因為他們大都是台灣光復前後出生的，所以可以看出一個新的語言趨勢；而且在數十年內還可以從本論文看出這一代人的語言現象。」(P.10)

當時社會語言學還不發達，年齡、教育程度這些社會階層現象是中國傳統方言學家忽略的問題，但在鍾露昇的調查中有清楚的界定。就這一點來看，鍾露昇的成就是突出的。

如前所述，鍾露昇的調查點共計 174 點，調查人數 448 人，平均每一個方言點 2.57 人。如果同一個方言點的發音人所回答的都是同一個形式，那當然沒有問題，但是事實不是這樣的，同一個方言點不同的發音人常有不同的回答。解決這個問題，鍾露昇所採用的是統計法。鍾露昇一面將所有的回答紀錄下來，保存了最原始的資料，一方面以區鄉鎮為單位，把統計上佔多數的形式做為代表形

式，繪入地圖內，共得 27 張方言分佈圖。為當代的台灣閩南語方言分佈留下寶貴的紀錄。

但是如果地區擴大了，這個方法就不靈了。可是鍾露昇也採用平均法另外整理出各縣市的優勢方言分佈圖，這就泯滅了縣市內部的方言界線了。鍾露昇既然不滿意方言複雜的台灣調查點止於縣市的層次，又為在縣市層採用了平均法，模糊了縣市內部的方言，這是理論上的矛盾。

鍾露昇的這篇論文是漢語方言學上最細密的調查，在漢語地理方言學上也是空前的成就。雖然有一點小缺點，但是瑕不掩瑜，他的成就將永為語言地理學家所懷念。

可惜的是鍾露昇完成了這篇論文沒有進一步做地理方言學的理論發展，並且發表後不久便移民美國，改行做漢語教育，不再做語言學研究，地理方言學的研究因而沉寂了一段時期。七十年代從事網狀調查的只有丁邦新的學生顧百里的碩士論文《澎湖群島方言調查》(1978)。鍾露昇的學生中繼續做方言調查研究的只有洪惟仁一人。

3.2 顧百里的澎湖方言調查

丁邦新的學生中有一位外國弟子顧百里(Cornelius Kubler)，這名美國人弟子不但國籍特別，他的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澎湖群島方言調查》(1978)研究題目也特別，他是丁邦新弟子中唯一作地理方言學研究的人。

顧百里的工作類似於鍾露昇，但是格局小得多一一他只做澎湖群島。雖然如此，顧百里可是親身到澎湖去訪問的，當時澎湖人口雖然只有 11 萬多人，但有 64 個小島，有人居住的有 21 個，如果要每一個有人住的小島都到也不容易。顧百里調查了澎湖縣全部 6 個鄉鎮，記了 500 個常用字詞，和一些語料，整理為「分地報告」; 又訪問了遍佈整個澎湖群島的 88 個村里，各記了 50 個「變化最多的字詞」，整理為「綜合報告」，詳細記下每個方言的記音資料，最後繪製了 12 張的方言地圖。

顧百里所調查的 50 個詞包括：

九十、四十、八十、好、廟、落、藥、雨、布、路、虎、姑姑、你、瓦、銀、洗、地、找、坐、月、狹、拿、我們、橫、血、鵝、笨、佛、壞、熊、立、曆、答、誰、自己、哥哥、姊姊、妹妹、伯伯、海豚、魷魚、東西、珊瑚、自行車、回去、唱歌、舒服、上面、上禮拜、哪裏

上面的調查詞項中，有許多字詞事實上並不是他所說的「變化最多的字詞」，如好、廟、落、藥、壞、熊、立、曆、哥哥、姊姊、妹妹、伯伯... ... ，並沒有重要的方言差；有些字詞如笨、佛... 等一個義項可以有幾個不同意義，問卷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受訪者可能不知如何作答，且其差異屬於口語或漢字音的問題，不是方言的問題。可見作者在調查之前對於閩南語或澎湖群島的內部方言差沒有充分的研究。作者最後只能整理出部分的字或詞繪製方言分佈圖是可以想見的。

顧百里在發音人的選擇上也有一點缺點，便是受訪人的年齡由 11 歲到 70 歲各個年齡層都有。雖然澎湖也許是一個方言穩定的地區，不像台灣的方言年齡層變化很大，但年齡差異無論如何是免不了的，這樣不分年齡層的作法不能不令人質疑。

雖然本論文有一些缺點，但是作為一篇碩士論文已經難能可貴。值得稱道的是作者是親身到鄉下、離島作田野調查，並且細密的程度達到村里，這是空前的，即使到今天，也沒有一篇台灣地理方言學的方言調查能夠做得這麼細。

3.3 卜溫仁的台灣語言圖集

淡江大學英文系卜溫仁教授(Warren A. Brewer)自 1993 年至 1999 期間在國科會的資助下進行了 1050 份訪查紀錄的「台灣語言學圖集」(Linguistic Atlas of Taiwan)調查計畫，調查語言包括閩南語、客語，而以閩南語為主。在調查的過程中還順便請受訪人講了共 350 條的民間故事，是很寶貴的語料。

卜溫仁的字表經過六次的修訂，前後所調查的詞項共 325 個，分為 13 類，都是一些常用詞彙。包括：

顏色、十二生肖、不同生長期及不同性別的家禽家畜、其他生物、昆蟲、人、身體構造、食物、自然景物、人工製品、其他

調查結果尚在整理之中，已經撰成的研究報告如：由 440 個方言點、824 份

受訪人紀錄製成的「大拇指變體分佈圖」，包括六個閩南語方言地圖和一個客語方言地圖；由 887 份紀錄製作的六張「鵝變體分佈圖」，其中一張是客語分佈圖，均利用 Arcview GI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軟體繪製而成。因為他的記音採用嚴式音標的印象式記音(impressive transcription)，聽到什麼記什麼，他把所記的音直接展示在地圖上，所以地圖上所顯示的變體很複雜，難以繪出同語線。

卜溫仁是有史以來台灣漢語方言調查人數最多的一人，也是第一個使用 GIS 軟體繪製語言地圖的人，他不但採用這個軟體繪製自己的方言地圖，並且將部分鍾露昇的資料及洪惟仁所繪台灣漢語方言分區圖重新輸入電腦，用 Arcview GIS 軟體繪製方言地圖。鍾露昇原圖是用曬圖方法製成藍圖，漫漶不清，日久更加模糊，經過 Arcview GIS 軟體繪製的方言地圖就顯得十分清楚。

3.4 洪惟仁初期的方言調查

洪惟仁自 1985 年 2 月起以個人力量開始對台灣各地閩南語、及閩南語區內的福建客語(即所謂「鶴老客」的客語)進行調查，起初他的調查字表只有 100 多個，調查方言點約 200 個，目的是對台灣閩南語的調查分佈做概略性調查，以便進一步作更詳細全面的調查，後來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漢語方言調查計畫，這個調查便成了一個領航調查(pilot survey)。

洪惟仁將調查經過及簡要的調查成果陸續在各種刊物發表，後來輯為《台灣方言之旅》(1992)出版，成為台灣閩南語及客語方言調查的一個簡要報告。書末

依據調查資料繪出台北、台灣的漢語方言地圖，這兩張地圖雖然簡單，卻是第一次根據實際的調查資料繪製的台灣漢語方言分區圖。

3.5 中研院史語所的方言調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即今語言研究所籌備處的前身，自 1988 年 3 月起至 1996 年 7 月止，前後九年間，在國科會的資助下，斷斷續續進行了六年多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這個計劃一直由龔煌城先生擔任主持人，洪惟仁擔任專任助理，駱嘉鵬擔任電腦程式設計，實際進行調查者以洪惟仁為主，負責大部分方言點調查。其次有張屏生(屏東、澎湖二縣)、許亮昇(中部數點)、潘科元(台北數點)等；還有駱嘉鵬(後龍、通霄) 、蔡錦雀(松山、中和)、姚榮松(三峽)、林英津(八堵)、許惠娟(秀水)。許瑞芬負責電腦處理。

這個計劃既然題為「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當然包括閩南語、客語的調查，可惜負責客語部份的學者一直都沒有時間進行調查工作，因此實際上只調查了閩南語。

這是一個非常大型的研究計畫，也是我實際參與的計畫，因此我用比較大的篇幅介紹。這個計劃可以分：調查目的、文獻研究與方言比較、調查字表的設計、調查成果四點來說明。

3.5.1 調查目的

當 1988 年開始進行「台灣地區漢語閩南語方言調查」計畫作時，經過討論，我們決定字表的設計應符合三項調查目的：

(1) 呈現所調查方言點完整的音韻系統。

(2) 呈現所調查方言在音韻上、詞彙上、語法上的特色，以建立比較方言學的、方言類型學的、地理方言學的、社會方言學的基礎資料。

(3) 製作方言地圖。

由此可見，這個計畫的調查目的不但可以涵蓋了傳統方言學兩個主要目的：(1)單點方言的完整音韻系統，(2)建立方言學的基礎資料，最大的特色是(3)建立地理方言學的基礎資料。至於單點方言的全面而詳細的描寫不是本計畫的目的。

3.5.2 文獻研究與方言比較

如前所述洪惟仁自 1985 年起便開始進行台灣閩南語的初步調查，搜集了約 200 個方言點的簡單材料。這段時間所做的初步調查成了後來大型調查的領航調查。

為了這個大型計畫，我們進行了兩項預備工作，一是收集閩南語的方言文獻，進行閩南語方言比較。一是根據我們的方言比較和領航調查所得資料進行調查字表的設計。

為了第一個目的，我們開始對黃謙《彙音妙悟》(1800)以來的所有泉州、漳州、潮州、海南島、台灣的各種方言資料做了比對，然後再和中古音一比對，閩南語各個方言之間的對應關係就非常清楚了。

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本人《台灣文獻書目解題：語言類》(1996)、《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共十冊 1993) 解題。其餘零星論文多篇。

這些文獻研究部分屬於歷史語言學的領域，但主要目的仍是有計劃的在做方言比較的研究工作。現代方言是由共同語分化而來，傳統漢語方言學重視現代漢語和切韻的比較有相當的道理，共時的研究應該也要有歷時研究的基礎，沒有文獻研究的基礎工作，方言調查將事倍功半。

3.5.3 調查字表的設計

把調查目的確定好了，方言比較也做好了，我們就很容易進行字表設計。我們的字表分語音、聲韻、常用語彙、語法四部份。

語音部份——為調查個別方言的音值或音韻系統的差異而設計。特點是收入大量的超音段成分的調查詞項，也把邊際音部份儘量收入，以便蒐集完整的音韻系統。

音韻部份——為調查方言間音讀上的差異而設計。根據閩南語內部方言差異，於各種對應類型中選取若干重要的、可顯示方言差異之關鍵語彙編成。

常用語彙部份——為調查方言間詞彙上的差異而設計。選取方言間具不規則聲韻變化、能表現方言之間的音韻特色；或用詞不同、能表現方言詞彙特色的常用語彙編成。

語法部分——為調查方言間語法成分之差異而設計。採方言間或年齡層之間具方言差異之若干虛詞、短句編成。

字表收詞約 1000 條，詳細調查至少需要八至十二個小時，分二、三天進行。因為調查時間太長，受調人有時會不耐煩，為了爭取時間、順利完成調查任務，我們另外抽出一個約 600 條調查詞項的簡表，可以針對特色不大的方言點在一天內調查完成。

和傳統的調查字表最大的差異是，我們的調查工作不為漢字的古音擬測服務，而是純粹為閩南語方言學服務；調查詞項不以「字」為單位，而以「詞」為單位；以口語為調查對象，不以書面語為調查對象。

雖然如此，但這不是說，我們沒有漢語史的基礎背景，或者是只重視「白話音」忽略「文讀音」，事實上我們非常注意現代閩南語方言和閩南語史、以及漢語史之間的聯繫，中古音和現代台語音的對應關係，文白異讀的問題，我們都沒有忽略。

雖然我們作了領航調查和文獻檢索、方言比較研究，但我們也發覺準備工作永遠都覺得不夠，從我們 1988 年開始進行調查，從實踐中隨時隨地都發現到新

的方言類型，一發現到一個新的類型，我們便要修改調查字表。所以實際上調查字表是一面調查、一面修改的。調查字表最初的版本只有約 700 個詞項，最後增加到 1000 多個。

3.5.3 調查成果

經過六年三個月的調查，我們終於完成了全台灣閩南語方言的調查工作。直到 1997 年 7 月止，我們的調查人數，詳表調查約 100 人，簡表調查將近 200 人，合計總調查人數共 277 人，實際調查地點，以鄉鎮分共 144 個，其中包括同一個鄉鎮內部不同的地域方言或不同的社會方言調查。平均起來同一個鄉鎮大約做了兩個發音人的調查。已經轉寫並輸入電腦的資料 13 萬筆。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還沒有記音的錄音帶，將來全部整理完成，預計將有 30 萬筆資料。

從 1988 年以來我們每一個年期結束都會撰寫調查研究報告，內容主要是「調查」資料、有些是成果分析。以下簡單地列出調查報告的篇名如下：

1989〈台灣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1992〈台灣中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1993〈台灣中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1994〈台灣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高雄縣部份〉

1996〈台灣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1997〈台灣東部及屏東、澎湖部份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另外單篇論文多篇，不一一介紹。值得一提的是潘科元在本人的指導下撰成碩士論文《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1996)是利用本調查計畫所蒐集的資料所展現的初步成果。

我們計畫將來把所有調查結果在網路上發表，讓全世界對閩南語方言有興趣的人都可以利用這些資料作進一步的研究。

這個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於建立地理方言學的基礎資料，這些資料的數量足夠繪製一千張以上的台灣方言地圖。但是實際上我們還沒有充分地利用它來作地理方言學的研究。有鑑於這個計畫尚多利用餘地，1999 年起由曹逢甫、王旭、何大安和本人共同主持的一項國科會計畫正從事台灣閩南語地理方言學的研究，我們計畫在 3 年內利用 Arcview GIS 軟體製成各式各樣的台灣閩南語方言分佈圖，並進行地理方言學的研究(詳參本文 4.3 節的介紹)。

3.6 涂春景的中部客語調查

如前所述，曾經做客語網狀調查的八十年代有千島英一、樋口靖、羅肇錦三人，規模都不大，值得特別介紹是九十年代的涂春景。它是唯一對台灣客語地理方言學有企圖心的語言學家。

涂春景著有《苗栗卓蘭客家方言詞彙對照》(1998)、《台灣中部地區客家方言詞彙對照》(1998)二書。這兩本書與前述客語網狀調查不同之處，一是調查詞彙相當多，卓蘭客語調查了 960 個詞項，中部客語調查了 1097 個詞項。詞項選擇

主要參考了詹伯慧、張日昇主編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彙對照》而略有增刪。

苗栗縣卓蘭鎮內方言複雜，鎮內市區說的是最先入懇的饒平客，後來有來自新竹的海陸客、來自苗栗其他地區的四縣客，另一種是作者所謂的「卓蘭腔」，四種方言並存鎮內，但方言之間有明顯的地理分佈。《苗栗卓蘭客家方言詞彙對照》的調查點共十三個，作者選擇了 12 個詞項，將調查結果繪製成 12 張方言分佈圖。

苗栗縣以南是閩南語的分佈區，客語散佈在中部四個縣的幾個鄉鎮。作者調查的範圍包括台中縣東部的豐原、東勢、新社、石岡，主要是丘陵地帶，說的是廣東大埔腔客語，此區是中部最大的客語區；雲林縣崙背、二崙幾個村落尚存福建漳州詔安客語，此區的客語只有中老人在使用；其餘彰化縣的二林、埤頭、竹塘、溪洲，南投縣的中寮、國性、埔里、魚池、水里、信義諸鄉鎮散佈著少數來自北部客家區的二次移民。《台灣中部地區客家方言詞彙對照》調查的方言點共 17 個，作者選擇了 10 個詞項，將調查結果繪製成 12 張方言分佈圖。

就調查詞項的數目和方言點的密集程度言，涂春景的成就是是空前的，這些調查資料進一步處理成更多的方言地圖、並作地圖分析，將有更高的利用價值。

4 社會方言學的調查

4.1 傳統方言學的盲點

傳統方言學收集方言資料有三個主要目的，一是為了「歷史比較語言學」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的研究收集比較材料；二是為了製作「方言地圖」，作「方言分區」、「方言分佈」研究的「地理方言學」建立基礎資料。三是對於個別方言的完整描寫。

關於第三點對於個別方言的完整描寫是所有個別語言研究的基礎，這樣的描寫當然越詳細越好。但是如果一個語言內部方言的同質性相同高，就沒有迫切的需要對語言內部方言做詳細描寫，通常只針對某些差異做比較就可以了。

歷史比較語言學是在收集足以顯示語言變化的方言類型，從而進行古語擬測與歷史發展的解釋。以此為目的的方言調查事實上忽略了方言地理分佈上的意義。這個缺憾不能不由地理方言學的研究來彌補。

但是地理方言學家的興趣在於地域方言，只要了解方言的類型以及類型的分佈，然後進行地理方言學的解釋，便已滿足了研究需要。

以上三種目的之下的漢語方言學是建立在結構語言學的基礎上的，理論上都假定一個「語言社區」(language community)內部具「同質性」(homogeneity)，有意無意的忽略了「異質性」(heterogeneity)的存在。地理方言學強調的只是地域方言變異，卻忽略了同一個方言社區也有所謂「社會階層化」(social stratification)問題。任何語言社區都不可能沒有社會方言，尤其是都市，社會方言更加複雜。因此就共時語言學的觀點來看，傳統方言學的方言調查在呈現一個方言的事實全貌方面不能說沒有盲點。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研究便是要彌補這個缺憾。然而這不是

說社會方言學可以取代傳統方言學的研究，傳統方言學關於單點方言的詳細描寫以及地域方言的調查研究不是社會方言學的方法所可以達成的。

4.2 起步中的台灣社會方言學

台灣的社會方言調查剛在起步階段，有一些研究生對某些方言點做了一些社會方言調查，如詹惠珍(1984)對台灣華語社會方言的調查，王芸亭、黃婷玉 (1998)對鹿港社會方言的調查；陳淑娟(1995)對關廟方言三代語音的調查；陳淑娟(2001)對桃園大牛欄方言的社會方言學調查，但多半屬於研究生習作，整體而言成績尚不理想。

規模比較大的台灣社會方言調查應屬曹逢甫、連金發《新竹地區語言分佈和語言互動的調查》(1996)，其第二章〈新竹市區語法結構分佈調查〉屬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由連金發、鄭縈、王本瑛執筆，是台灣第一份閩南語甚至漢語的語法社會方言調查。這個計畫雖然把調查項目限定在動補結構和否定結構，總共調查的句子已達有 110 個；發音人依年齡分老(51 歲以上)、中(31-50 歲)、青(15-30 歲)三個年齡層；依照地域分為東區、北區、香山，並調查了客家人或出外人(高雄)作為對照組。結論是新竹市閩南語的語法受到華語很大影響，而且越年輕所受影響越大，但是不同類型的補語或否定詞變化的速度不一致，有些地方變化得快有些地方變化得慢，證明詞彙擴散理論也可以應用在句法上。

這個調查研究因為屬嘗試性質，在閩南語語法類型的分析、調查的方法上尚

多改進的餘地，但在社會方言學研究史的發展上有劃期性的貢獻。

4.3 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調查計畫

清華大學教授曹逢甫、王旭，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何大安和我正在進行一項國科會資助的「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的調查研究計畫。1999 年由王旭主持，2000 年起由本人主持。整個計畫分 3 年期完成。除了繼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閩南語方言調查成果從事台灣閩南語地理方言學的研究(參見本文 3.5.3 節)之外，最重要的是閩南語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研究。調查目的是要了解閩南語的語音是如何在進行演變的，這個演變的趨向是否和青年的語音認同一致，是否和老年層所顯示的方言分佈一致，也就是說分佈廣的變體是否就是將來演變的趨勢或青年主要認同的變體。如果一致，這表示演變趨向是由人口競爭力決定的，如果不一致也許就要求諸語言內部結構的動機。

我們的社會方言學調查包括兩項工作，一是調查不同年齡層、性別、職業的方言變體，從而了解閩南語共時演變的實況。一是調查現代青年，包括不同的語言背景的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對某些閩南語方言變體的認同。

直至 2001 年 8 月為止，我們已經完成社會方言調查的方言點有：基隆市；台北縣汐止、三重；桃園縣桃園市、大溪、大牛稠、蚵殼港；新竹市；苗栗縣白沙屯；台中縣清水西勢寮社區；彰化縣鹿港；雲林縣麥寮；宜蘭縣礁溪等 11 個地點。除了基隆、桃園、宜蘭是漳腔區之外，其餘都是泉腔區。調查工作還繼續

在進行中。

我們將依年齡分為老年(60 歲以上)、中年(40-59 歲)、青年(20-39 歲)、少年(20 歲以下)，共四個年齡層，每一個年齡層再分為男女兩個性別、勞動與白領兩個社會階層，以全面觀察方言變體和年齡層、職業、性別的相關性。每一個相同變數的 cell 規定至少調查 3 個人，因此一個方言點完整的社會方言調查至少要調查 48 個發音人，但因為鄉村地區很少白領階層，所以在鄉村地區我們只調查了 24 位勞動階層。

至於青年語音認同，2000 年一年中我們調查了 12 所大學院校，訪問了 769 名大學生。這些學生主要是閩南人，但也有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只要聽得懂閩南語都在訪問之列。我們設計了一套錄音問卷，詢問其對閩南語音韻變體「哪一個聽起來最習慣」。學生的父親族群、本人第一語言等問題，都設計在問卷之中加以調查，因此本問卷也兼有語言社會學的意義。

所有社會方言學的調查資料，我們都已經輸入電腦，駱嘉鵬所設計的軟體可以做出任何我們需要的統計，比如我們可以要求個別「字」的音讀變體在台灣的地理分佈，在不同方言的不同年齡層、不同階層的分佈、或不同方言區青年認同的比例，我們也可以按字類，整批的統計某一字類的不同分佈情形。

現在把調查結果做一個簡單的報告，因為統計數字非常龐大，以下只選擇「入」字頭，以少數方言點為例來說明。

「入」字頭約當於中古漢語的「日」母，但也有包含一些非「日」母字(如「字」)。我們調查的字包括我們的字表所選的「入」字頭的字，包括字、乳、兒、二、忍、人、迡、入、日、挼、裕、熱、閏、潤、韌等 15 字。。漳州《十五音》和泉州《彙音妙悟》沒有什麼方言差。這個聲母在閩南語主要有三種變體：(1)j-[dz/z]是最古老的音讀，部分泉州腔唸成(2)l-，混同<柳>字頭，部分漳州腔在齊齒音之前唸成(3)g-，另外在我們的調查中有一個回答「入來」的「入」字讀 bip，這是受到韻尾的同化。

以下表一至表三是「入」字頭三個變體在台灣北部三個方言點的四個不同年齡層的分佈情形。表四則是大學生對各個變體的認同情形。

表一、汐止方言「入」字頭變體在年齡層上的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817	86.27	191	69.45	195	89.86	261	95.25	170	93.93
j-	122	12.89	84	30.54	20	9.21	11	4.01	7	3.86

表二、基隆方言「入」字頭變體在年齡層上的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716	74.69	187	60.71	193	77.31	196	84.85	140	82.36
j-	223	23.22	111	36.03	50	19.88	33	14.29	29	17.06
gi-	18	1.88	8	2.60	7	2.81	2	0.87	1	0.59

表三、桃園方言「入」字頭變體在年齡層上的分佈

	總計		老		中		青		少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185	45.23	25	23.81	44	41.51	52	52.52	64	64.65
j-	168	41.08	77	73.33	40	37.74	27	27.27	24	24.24
gi-	51	12.47	3	2.86	22	20.75	16	16.16	10	10.10
bip	1	0.24	0	0.00	0	0.00	0	0.00	1	1.01

由上面的資料，我們看出「入」字頭保存 j-音讀比例最高的是漳州腔的桃園市方言，但即使在這個典型的漳州區平均也只有 41.08%，其餘 12.47%說成 gi-，有一個人說成 bip，違反了唇音異化律。而將近一半的 45.23% 唸成 l-。混合區的基隆方言變成 l-的有74.69%，典型泉州區的汐止方言則高達 86.27%。三個北部方言，「入」字頭都傾向於變成 l-，越是泉州腔，l-的比率越多。

從年齡分佈來看，表中呈現 j-變體隨著年齡的降低逐漸下降，相對的 l-變體則隨著年齡的下降逐漸上昇，gi-變體只流行於桃園，在桃園的中年層有昇高的趨勢，但在青年層和少年層則有下降的趨勢，顯示的意義是桃園曾經有一時期有 ji→gi 的趨勢，但是最後敵不過北部優勢音 l-的競爭而沒落了。

以下讓我們來看看青年認同的情形。

表四、不同語言區或方言區大學生對「入」字頭變體的認同

	總計		偏漳區		偏泉區		混合區		客語區		南島語區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筆數	百分比
l	2823	52.87	887	48.21	785	63.41	891	50.54	256	53.44	4	20.00

j	2107	39.46	789	42.88	415	33.52	701	39.76	186	38.83	16	80.00
g	410	7.68	164	8.91	38	3.07	171	9.70	37	7.72	0	0.00

由表四可以看出偏漳區大學生選擇 j-變體的有 42%，和桃園市大體上一致，由混合區的 39.76%、而泉州區的 33.52%逐漸減少，相對的偏泉區選擇 l-變體的有 63.41%，混合區 50.54%，偏漳區 48.21%，整體而言，偏泉腔偏好 l-變體，偏漳區偏好 j-變體。這個現象和以上三個方言點的偏好情形是一致的。但總計起來 l-變體佔 52.87%、j-變體只佔 39.46%、g-變體更少，只佔 7.68%，顯示「入」字頭以 l-變體佔了絕對優勢。

有趣的是，來自非閩南語區的大學生，南島語區的調查人數較少不好比較，姑且不談；值得注意的是來自客語區的，j-; l-; g-三個變體的比率和總比率幾乎完全一致。這個統計數據顯示的意義是：閩南語台灣優勢音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這個事實如實地反映在沒有方言成見的客家人語感中。整體來看，台灣閩南語 j-→ l-的趨勢是無法扭轉的。

漳、泉古韻書「入」字頭都還是獨立的一個聲母，依照我們前述地理方言學的調查，在台灣閩南語的老年層，分佈最廣的變體是 j-，其次是 l-，最後是 g-，換言之 j-是地理方言學的優勢音，但是社會方言學的調查卻證明 l-最佔優勢，這個例子正好違反了「分佈越廣的變體競爭力越強」的原則，分佈廣的變體反而在競爭中失敗了。這個矛盾證明了台灣閩南語的音韻結構本身有自己的動機。閩南語的「入」字頭是最特殊的聲母，其特色有：

1. 唯一的濁擦音(或濁塞擦音)。

2. 唯一濁音不鼻化的聲母。

3. 結合限制最大，只能接-i 和-u，因而涵字最少。

前 1, 2 點破壞了閩南語聲母系統的整齊性(neatness)，第 3 點顯示「入」字頭的區別功能低。這樣的「音位」存在的價值比較低，它在閩南語音韻系統中的存在早就埋伏了消失而歸併到其他聲母的動機(motivation)，同時預示了閩南語音韻演變的潮流(drift) (薩丕爾(Sapir)語)。

5 結論

這篇論文簡單的介紹了台灣漢語閩南語、客語方言學研究的歷史，研究潮流的演變，以及潮流演變所帶來的方法上的進步。我們特別把介紹的對象限定在台灣漢語的共時研究，關於歷時研究不在介紹的範圍內。

台灣有她特殊的歷史人文條件，她受到外來文化衝擊最多，造就了台灣語言學的多元發展。她曾經是基督教傳教最成功的地區，也是羅馬字(白話字)推行最成功的地區，傳教士曾經在這個地方完成了許多羅馬字字典，收集了許多閩南語詞彙，創造了許多閩南語文獻；她是日本統治最久的殖民地，日本殖民政府在此完成 19 部閩南語辭典、1 部客語辭典，10 種台語雜誌，100 餘冊閩南語教科書；第二次戰後，國民政府帶來中國的學術，在語言學上有非常傳統的聲韻學，而董同龢等人也帶來結構主義語言學、歷史比較語言學；她並且深受美國學術的影響，

留美回國的語言學家把新的語言學方法傳進台灣，在方言學上，鍾露昇帶來的地理方言學和九十年代興起的社會方言學無疑的是受到美國語言學的影響，雖然方言學在美國和台灣都不是主流。

這些不同的文化衝擊下產生的不同流派的方言學，實際上已經涵蓋了共時方言學的全部了，台灣的漢語方言學不但有單點方言的詳細描寫，有方言比較，也有研究地域方言的地理方言學，研究社會方言的社會方言學，這些顯示台灣的漢語方言學是多元的發展。

台灣漢語方言學的發展方向也反映了世界方言學的潮流，語言學家的注意力逐漸由地域方言轉向社會方言，我們可以預見社會方言學將在台灣得到更蓬勃的發展。

參考文獻

閩南語

Barklay, Thomas(巴克禮)

1923 *"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Amoy"* (《漢英大辭典補編》) The Com- mercial Press Limitted, Shanghai.

Brewer, Warren A.(卜溫仁)

1995 'LAT94' (台灣語言學圖集 94 年計畫案) 國科會報告

1996 'LAT96' (台灣語言學圖集 96 年計畫案) 國科會報告

1998 'LAT97' (台灣語言學圖集 97 年計畫案) 國科會報告

1999 'LAT99' (台灣語言學圖集 99 年計畫案) 國科會報告

1998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hamb',"* annual meeting of Yuan Re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Dialect Fieldwork,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WA.

Cambell, William(甘為霖)

1913 *"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廈門音新字典》)

Douglas, Carstairs(杜嘉德)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漢英大辭典》) Trüber & co., London.

Mackay, G. L.(馬偕)

1891 "Chinese Romanized Dictionary of the Formosan Vernacular"(《中西字典》) 台北耶穌教會出版

Medhurst, W. H. (麥都思)

1837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福建方言字典》)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Maccao,China.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

丁邦新

1980《台灣語言源流》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80〈澎湖語彙〉《中國書目季刊》14.2:167-243

丁邦新、楊秀芳

1991《台北市志社會志語言篇》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小川尚義主編

1907〈日台日台大辭典緒言〉載《日台大辭典》, 台灣總督府

1907〈台灣言語分布圖〉載《日台大辭典》, 台灣總督府

王本瑛、連金發

1995〈台灣閩南語中的反復問句〉, 收入台北· 文鶴出版公司《台灣閩南語論文集》pp.47-70

王育德

1955.8〈台灣語の聲調〉,《中國語學》41：609-617。

1957.8〈福建語の教會羅馬字について〉,《中國語學》60：301-309。

1957《台灣語常用語彙》, 東京· 永和語學社出版。

1958 "An investigation about Literary Reading and Colloquial Reading in the Amoy Dialect",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載（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紀要）3:67-70。

1960.4-1964.1《台灣語講座》(第 1～24 回)，連載於《台灣青年》第 1～38 號

1960.9〈中國五大方言の分裂年代の言語年代學的試探〉,《言語研究》38：33-105。

1967〈中國の方言 1 總論〉，收入東京· 大修館《中國文化叢書 言語》407-447。

1968〈十五音について〉《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紀要》13：57-69。

1969.12〈福建の開發と福建語の成立〉,《日本中國學會報》21 集：123-142。

1969.3《閩音系研究》，東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收入《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1973)

1969.7〈福建語における『著』の語法について〉,《中國語學》192 號：321-325。

1970〈泉州方言の音韻體系〉,《明治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8+9：1-31。

1972《台灣語入門》東京· 風林書房；1982 年，東京· 日中出版。

1983《台灣語初級》東京· 日中出版。

1985〈台灣語の記述的研究はどこまで進んだか〉,《明治大學教養論集》通卷 184 號，又收入《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1973) 1411～1509。

1987《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東京· 第一書局

王芸亭、黃婷玉

1998〈閩南語鹿港方言母音轉變的社會調查〉收入黃宣範編《第二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王建設、張甘荔

1994《泉州方言與文化》(上下冊)廈門· 鷺江出版社

石娉娉

1997《從自主音段音韻學觀點看金城方言聲調學》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吳守禮

1954《台灣通志稿卷二人民志語言篇》台灣省文獻處

2000《國台對照活用辭典》遠流出版公司

李仲民

1998《台北縣雙溪閩南語初步研究 - 調查、比較與方言界線之探討》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佳純、連金發

1995〈論閩南語比較式ㄧㄧ類型及歷時的探討〉，收入台北· 文鶴出版公司《台灣閩南語論文集》pp.71-85

周法高

1964《桃園縣志卷二人民志語言篇》桃園縣政府

林珠彩

1995《台灣閩南語三代間語音詞彙的初步調查與比較－以高雄小港為例》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洪惟仁

1989《台灣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國科會研究報告

1992《台灣中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國科會研究報告

1993《台灣中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國科會研究報告

1994《台灣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高雄縣部份》國科會研究報告

1995《台灣南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國科會研究報告

1996《台灣東部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國科會研究報告

1993《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1-10 冊)台北· 武陵書局

1992《台灣方言之旅》台北· 前衛出版社

1997《高雄縣閩南語方言》高雄縣政府出版

1991〈田野調查與理論假設的辯證發展〉中央研究院田野研究室「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8:45-47。收入《台灣方言之旅》pp.57-63

1993〈大牛椆方言——台灣客語區內一個來自惠州的漳州方言島〉香港· 第三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1991.3〈田野調查與理論假設的辯證發展〉中央研究院田野研究室「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8:45-47。收入《台灣方言之旅》pp.57-63

1993〈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的一些發現〉台北·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7:10-25

1994〈現代斗六方言與黃有實《台灣十五音辭典》及《十五音》音系比較〉台北·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藏與台灣史研究論文發表研究會彙編》pp.157-193

1994〈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的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台灣史研究》1.2:26-84

1995〈台灣彰化王功方言——一個多種變調的閩南語方言〉Seattle· David Prager Branner(ed.)"Yuen Ren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元任學會漢語方言資料寶庫)1:3-54

1995〈漳泉在台灣的融合〉國立台南師範學院《國語文教育通訊》11:84-100

1996〈台灣雲林北港方言——一個泉州惠安腔的台灣方言〉Seattle· David Prager Branner(ed.)*"Yuen Ren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 (元任學會漢語方言資料寶庫)2:59-112

1996《台灣文獻書目解題：語言類》台北·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出版

待刊《新竹市方言志》新竹市政府

張屏生

1992《潮陽話和其他閩南語的比較》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4〈金門方言的語音系統 - 以金城鎮方言為例〉第十二屆全國聲韻學學術

研討會論文

1995《同安方言及其部分相關方言的語音調查和比較》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張振興

1983《台灣閩南語方言紀略》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閩語的分區(稿)〉《方言》1985.3:171-180

1992《漳平方言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7〈重讀「中國語言地圖集」(初稿)》北京· 第三十屆國際漢藏語暨語言學研討會

張賢豹(光宇)

1976 〈海口方言〉 台大中文系碩士論文

曹逢甫、連金發

1996《新竹地區語言分佈和語言互動的調查》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委託研究計畫

陳淑娟

1995《關廟方言「出歸時」的研究》台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1〈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台灣清華大學· 2001 年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論文

楊秀芳

1982《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台大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1988《台南市志人民志語言篇》台南市政府

董同龢

1959 〈四個閩南方言〉台北· 史語所集刊 30 本

董同龢、趙榮琅、藍亞秀

1967《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話》台北· 史語所單刊甲種 30 本

董忠司

1991〈台北市、台南市、鹿港、宜蘭方言音系的整理和比較〉 新竹· 新竹師範學院編印

2001《台灣閩南語辭典》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劉秀雪

1998《金門瓊林方言探討》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潘科元

1996《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曉峰

1997《孔夫方言調查報告》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縈

1994〈金門官澳方言初探〉載余光弘、魏捷茲編《金門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文集》台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盧淑美

1977《台灣閩南語音韻研究》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鍾露昇

1965《福建惠安方言》手稿

1967《閩南語在台灣的分佈》 台北· 國科會報告，油印本

藍清漢

1980《中國語宜蘭方言語彙集》東京· アジア· 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羅常培

1931《廈門音系》北平· 中研院史語所單刊甲種之四；1956 年 12 月北京· 科學出版社影印；又 1975 年台北· 古亭書屋影印

顧百里

1978《澎湖群島方言調查》台大碩士論文

樋口靖

1981〈台灣境內閩南語方言的語音特點〉竺波大學《言語文化論集》10: 95-102

1983〈台灣閩南語鹿港方言の語音特色〉《中國語學》230:8-18

1990〈海南島崖縣方言の音韻體系について〉筑波大學外國語センタ -《外

國語教育論集》7: 309-325

客語

Chang, Linging(張玲英)

1987 *"Studies in Hakka Morphology and Syntax"* 輔仁大學碩士論文

MacIver, D.(1905) , Mackenzie (revised)

1926 *"A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Hakka-Dialect as Spoken in Kwang-tung Province "* 台北· 南天書局影印再版

Rey, CH.

1926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Dialecte Hac-ka"* Hongkong: Imprimeri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Etrangères, 台北· 南天書局影印再版

Schaank, S. H.

1897 *"Het Loeh-Hoeng-Dialect",* Leiden : Boekhandel en Drukkerij.

千島英一、樋口靖

1986〈臺灣南部客家方言概要〉,《麗澤大學紀要》42

呂嵩雁

1993《台灣饒平客家方言》東吳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周法高

1964《桃園縣志人民志語言篇》桃園縣政府

張屏生

1997〈《客家話讀音同音字彙》的客家音系ー ー 並論客家話記音的若干問題〉,載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73-194

1998〈台灣客家話調查所發現的一些現象〉,載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與

語文競賽研討會文集》1:7.1-18

1998〈台灣客家話部分次方言的詞彙差異〉新竹師範學院· 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台灣語言及其教學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61-274

1998〈東勢客家話的超陰平聲調變化〉新竹師範學院· 母語教育研討會論文

張雙慶、李如龍

1993《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大學出版社

黃基正

1967《苗栗縣志人文志語言篇》

楊時逢

1957《臺灣桃園客家方言》，台北· 史語所單刊甲 22。

1971〈臺灣美濃客家方言〉，台北· 史語所集刊 42.3:405-465

董同龢

1948〈華陽涼水井客家記音〉收入丁邦新編《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1981)pp.153-273

鍾榮富(Chung, Raung-fu)

1989 *"Aspect of Kejia Phonology"*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1997《美濃鎮誌語言篇》美濃鎮公所

1997〈美濃客家語言〉載高雄縣文獻叢書 9 :《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化》293-444

(待刊)《六堆客家鄉土誌語言篇》

羅肇錦

1985《客語語法》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87〈臺灣客語次方言的語音現象〉《師大國文學報》16:289-326

1989《瑞金方言》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90《台灣的客家話》台北· 台原出版社

樋口靖、千島英一

1986〈台灣南部客家方言概要〉《麗澤大學紀要》42:95-148

江俊隆

1996《台中東勢客家方言詞彙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涂春景

1998《苗栗卓蘭客家方言詞彙對照》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獎助出版

1998《台灣中部地區客家方言詞彙對照》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獎助出版

江敏華

1998《台中縣東勢客語音韻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雁雯

1998《台灣四縣客家話構詞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